

論中國學術與社會科學理論之關係⁺

黃俊傑^{*}

自從十九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份子接觸西方社會科學以後，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歷史經驗之間一直存有某種緊張性，廿世紀中國知識子常以中國經驗屈從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也有人完全將中國經驗視為社會科學普遍理論的例外。

本文論證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學術之間，有其辯證性的有機關係，因為社會科學理論如果忽視中國學術，將成為跛腳的學術。而且，中國傳統學術也必須建構普遍性的理論性命題，才能使中國學術不再是孤芳自賞的「地域性的知識」（人類學家Clifford Geertz所謂的"Local Knowledge"）。兩者之間在研究內容上有其不可分割性，但在方法論上又有其緊張性。因此，兩者間存有競爭支配地位之關係。但是，兩者合則雙贏，離則兩傷。

我們要論證社會科學研究與中國傳統學術之不可分割性，可以先從兩者斷為兩橛後的負

面效果說起。這種負面效果首先表現在當代西方社會科學界對中國儒學的誤解之上。廿世紀中國以及國際社會科學界對於儒家政治思想的誤解，可謂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基本上認為儒家是威權主義與集體主義，均有利於傳統亞洲的專制政治。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科學家要求儒學為政治的專制主義與社會的集體主義負責，並不公平，這種說法犯了「化約論的謬誤」。歐美社會科學界這種思考上的盲點，固然與各別社會科學家的學力有關，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在於社會科學界對中國傳統學術的忽視。

社會科學理論的建構必須將中國歷史經驗納入考慮，近年來愈來愈多西方社會科學家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我們舉美國的社會學家史柯普（Theda Skocpol, 1947-）為例加以說明。史柯普研究的主題是近代世界史上的「社會革命」（social revolution），她所謂的「社會革

⁺ 本文係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五日本院人文社會科學討論會內容。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合聘研究員、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命」是指某一個社會中「國家」或階級結構之快速而基本的轉變。她認為，對這種「社會革命」的分析，必須採取結構的觀點，並特別注意革命的國際脈絡以及導致舊政權瓦解新政權建立的國內因素。她主張「比較的歷史分析」是最適當的研究方法。史柯普的書就從國家結構、國際力量以及階級關係入手，分析一七八七年到一八〇〇年代的法國大革命、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三〇年代的俄國革命，以及一九一一年到一九六〇年代中國革命。史柯普將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經驗，放在比較的視野中加以分析，提出許多創見，對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學說，既加以吸納融會，而又提出修正。全書論述引人入勝。史柯普從中俄法三國的歷史經驗指出，「國家」雖然是一種行政的與強制性的組織，但是，「國家」常常具有某種潛在的「自主性」，而不受階級的控制。她認為在分析「社會革命」時，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史柯普的書之所以能在這三大革命的歷史事實中提煉理論，主要可以說得力於她在西方歷史經驗之外，再將中國歷史經驗納入考慮，從而在三個革命經驗中既求其同，又見其異。從史柯普的例子，我們看到了中國歷史經驗在建構社會科學理論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從研究方法的角度來看，社會科學家企圖從人類行為中，歸納出若干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則，以便對人類行為進行解釋，甚至對未來的發展提出預測。就其對人類社會的普遍理則的追求而言，社會科學家的研究方法論，近似新康德學派哲學家溫德班（Wilhelm Windelband, 1848-1915）所謂的「理則的知識」（*nomothetic knowledge*）。

相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上述特質，中國傳統學術的主要領域如文學、歷史、哲學等，都

具有強烈的描述特殊人物或事件的傾向。例如傳統中國論述政治的文獻多因本於致用之目的而缺乏原理性之探討，因此，從方法論傾向言之，社會科學研究與中國傳統學術實不免有其相互緊張性在焉。這種緊張性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理則的知識」與「意喻的知識」（*ideographic knowledge*）之間的緊張性。

我們再進一步討論：社會科學研究與中國學術之間的緊張性，是否能夠被克服呢？我認為，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實際上常常「即特殊性以論普遍性」，並且從具體經驗中提煉抽象命題，而且，中國傳統學術所研究的歷史經驗潛藏著大量不同於西方的問題意識，可以補當前社會科學界之不足。所以，兩者間之緊張性之克服實建立在兩者「互為主體性」的基礎之上。

當前海峽兩岸中文社會科學界中研究有關「國家」（*state*）、「民間社會」（*civil society*）、「理性」（*rationality*）、「權力」（*power*）等議題的文化資源均來自西方歷史經驗，而由於西方社會科學界的支配性地位，將原是從具體而特殊的西方歷史經驗中所建構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推廣而成為普遍的學說。在這種推廣過程中，西方學術「典範」（*paradigm*）實居於霸權之地位。

展望未來，廿一世紀漢語學術界的社會科學研究，應該從西方支配走向東西互為主體。我們愈深入中國歷史經驗以及研究這種經驗的學術傳統，愈能夠出新解於陳編，愈能夠提出新的社會科學概念與命題，而與西方的同事進行富有啟發性的對話。中國傳統學術的研究如果愈能參考社會科學的概念與方法，就愈能夠開拓新的視野，社會科學與中國傳統學術本來就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